

# 现代文学批评研究的一大贡献

□袁进

最近，黄霖教授主编的《现代（1912—1949）活体文学批评文献丛刊》共12卷800万字的丛书由凤凰出版社出版了，这是对现代文学批评研究的一大贡献。关于“活体文学批评”，黄霖教授在序言中作了这样的一个概括：中国古代从宋代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开始，就有“诗话、词话、文话、曲话、小说话”一类形式独特、自成一体”的文学批评体例。19至20世纪之交，报刊等新兴媒体如雨后春笋，需要随笔漫谈式的文学批评论述作为专栏连载，提高报刊的档次，吸引读者。于是从旧文体中发掘，类似“诗话”类文体的丛谈、闲谈、笔谈、琐谈等等纷纷问世，黄先生就用“活体文学批评”来归纳这类文论，并且将所找到的文献编成这部庞大的丛刊，与古代活体文学连接。这是一项从无人做过而又颇为费力的工作，尤其是众多文章来自大量报刊的连载，有许多报刊并不著名，需要到全国各地各家图书馆一页一页的寻找。

现代有关“旧体”文学与文学批评在当下大陆研究界崛起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有的学者曾将这些现代“旧体”文学与文学批评概称为“民国文学”，主要是用于矫正过去习用的“新文学史”“现代文学史”只讲“新文学”，忽略同时代问世的“旧体”文学研究，这也是造成当下古代“活体文学批评”受到古典文学研究界的重视，而“活体文学批评”反倒无人问津的主要原因。“民国文学”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学史，当然应该涵盖这个时代各个方面的主要文学，否则就是文学的流派史，难以包容整个时代的文学。“民国文学”概念提出已有一段时间，可是相应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旧体文学的文体研究史，还缺乏从整体的“民国时代”来观照整体文学研究

的“民国文学史”，因而仍然未脱“文学流派史”的窠臼。原因在我看来主要出之两个方面：其一是民国旧体文学的数量惊人，多年来被学界所忽略，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爬梳剔抉，才能作为文学史研究的基础；其二则是能涵盖民国时代文学总况的叙述框架很难搭建，民国时期新旧文学的对立，看上去似乎是中西两个系统，很难在一部文学史中把它们融合在一起。正是在这两个方面，黄霖教授主编的《现代（1912—1949）活体文学批评文献丛刊》对现代文学批评的研究做出了新的有益尝试，引起我的一些思考。这部丛刊虽然免不了还有遗漏，加上已经出版的民国诗话、词话从编和其它文体的活体批评，从1912年到1949年间活体文学批评的多数文献都已出版，它们必将对现代文学批评研究产生重大的推动。

1912年至1949年是中国社会走向现代的过程，进入工业社会的需要，白话取代了文言。短短三四十年间，语言文学发生巨大变化，文化的急剧变化，造成局面错综复杂。现代文学作为历史的叙述，应当适应现代社会文化所呈现的复杂性。事实上，当时的现代文学客观存在三大块：首先是代表时代潮流的“新文学”，以接受国际上的先进文学和先进思想改造中国的语言 and 思想，奠定了今日中国的语言文学。但是对旧文学的看法上，新文学的内部又是错综复杂的，如丛刊总序所引“茅盾在1922年发表的《“文学批评”管见》，他说“中国一向没有正式的什么文学批评论，有的几部大书如《诗品》《文心雕龙》之类，其实不是文学批评论，只是诗赋词赞等文体的主观定义罢了”，对旧文学的文论持全盘否定态度。但是，丛刊在《文话卷

一》中，编辑了叶圣陶在1924年出版的《作文论》，书中在讨论作文的构思和组织时，引用了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方其辘轳，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他真能说出这种经验以及它的来由。”可见，叶圣陶倒是把《文心雕龙》作为权威来引用的。他与茅盾这时是邻居，而且是好朋友，但是对旧文学的态度两人并不相同。丛刊把新旧文学的文话放在一起，体现了时代的复杂性。今日的台湾文学直至文化，与大陆有不少差异，也体现了民国时代新旧交融转型时的复杂性。

其次，与“新文学”对立的一面是“旧文学”，1949年以后，大陆学术界建构“现代文学史”，基本上沿用五四时期“新文学是活文学，旧文学是死文学”为价值标准，所以现代文学史只写新文学，没有“旧文学”的地位。尽管许多新文学家甚至革命家仍然在写旧诗词抒发自己的情感，但就是他们这些写得富有魅力的作品，也不能作为这个时代的文学进入文学史。其原因在于新文学用的是西方价值体系，旧文学是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王国维自杀时，许多人都认为他是殉情而死，惟有陈寅恪认为他的死是“殉文化”，由此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学界大多数人所拥护。王国维的所有成就与学习西方是分不开的，陈寅恪是熟悉西方的留学生，之所以能理解王国维，因为他有陈三立这样的父亲，陈三立其实也是殉文化而死。晚清

民国的旧体文学家许多人为旧文学面临灭亡而痛苦，他们在活体中喜欢梳理师承，强调格律，提携旧体文学作者，维护旧体文学的传承。陈三立、沈曾植等人戊戌变法时都是维新派，他们只是站在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立场上学习西方。因此，如何正视中国文学的历史延续，建立一个新的文学批评价值体系，兼顾新旧文学的评价，形成中国特色，正是我们面临的课题。第三是介于新旧文学之间的中间派，也是改良派。他们有的曾经是“新小说”等新文体的作者，在晚清民初就是文学的改良派。五四时，他们不赞成激进的文学革命，否定旧文学；但也不愿为守旧而殉文化。他们大多是教师、报人、编辑，职业促使他们不断地迎合学生和读者的需要调整自己的观点，向新文学靠拢。他们的迎合因为增加销路受到社会与媒体、出版社的欢迎。也因为注重迎合小市民趣味，受到新文学的排斥。代表作家如张恨水、包天笑、周瘦鹃、姚鹓雏等。在丛刊之中，这一派的作品远远超过新文学与旧文学，占了大多数。他们的折中态度和趣味性，也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黄霖教授眼光独到，在一部丛刊之中同时收入了新文学、旧文学、中间派的“活体文学”，展现了民国“活体文学批评”的全貌。期望黄老师建立一个新的文学批评价值体系，为现代文学批评的研究，开创崭新的局面。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 七十绝妙好诗，一门大学课程

□张永堃

者根据自己的兴趣各取所需。我们可以随便翻到某一章某一篇进行阅读，都毫无障碍。同时，各章之间又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组合起来是一门完整的课程。背景介绍相当于课程的导论，名篇讲解则是课程的主干，问题与思考是这门课的延伸与扩展。可见，本书在形式上是一本图书，但实际上也是一位学界名师传道授业解惑的精品课程。通过阅读本书，我们仿佛亲临大学中文系的课堂，得以倾听宋人的神韵情思。

“阅读背景”开篇明义，指出宋诗的几个特点：以平淡为美、多日常生活题材，富有理趣，关注现实政治、爱国主题高扬等。而这些特点植根于宋代的政治、社会、文化背景，提纲挈领，要言不烦，介绍了宋诗的整体风貌，且使读者不仅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从而为后面阅读具体的诗篇与研究打下了基础。在这样的宏观认识基础上，读者可以更好地知人论世，领略宋诗的独特魅力，理解学术研究创新价值。“研究概述”一章是极具功力的学术综述。一般的古诗词读物，很少向读者介绍学术史与研究动态，这就使学术研究局限在象牙塔之内，与社会大众绝缘。实际上，一方面，当今大众的阅读层次不断提高，在传统文化方面，对于学者的研究进展也有不少感兴趣的读者；另一方面，学者的学术研究也有很多富于现实价值的课题，值得介绍给大家，正如作者在本书中所言：“宋诗研究是为了更好地推进广大读者的宋诗阅读，是为了让读者拥有更完整、更可靠的阅读文本，并得到更准确、更生动的解释、讲解。”因此，对于学术动态的揭示，

既使本书与同类读物显著区别开来，呈现出本书的“大学课程”属性，也确实贴合部分读者的需求，填补了市场空白。

“名篇细读”共选诗20首进行详细解读，作者没有明言选篇标准，只说“所选名篇并无高下之分”（序），但读后我们便能发现，这其实是一位学者出于专业眼光所做出的选择。所选各诗当然字句精警，均为千古名篇；但相较于脍炙人口的名句，作者更想进行解说、更希望与读者分享的，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代表性诗篇。换言之，与同类类型的诗作相比，这首诗是否有新的突破，或者与诗人自己的其他作品相比，这首诗是否做到了独树一帜，又或者与同时代的诗作相比，这首诗是否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这些才是本书选篇时更为看重的。作者细读苏轼《游金山寺》，指出此诗将游览与写景融为一体，同时渗入身世之感乃至政治意味，是对游览诗的扩展与提升；细读王安石《示长安君》，展示性格刚直的“拗相公”王安石性格中也有温柔和婉的一面，而这往往不为人所知；细读文天祥《正气歌》，认为洋溢在诗中的浩然正气无疑是崖山沦陷而中华未亡的坚确证据。所选诗篇、所作解说，都是基于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的广泛阅读与坚实研究。

“名篇浅释”选诗50首，限于篇幅，每首诗的鉴赏不能详细展开，但所涉内容非常丰富，既重点突出对于写作背景的介绍，也充分征引历代学者的精妙点评，更巧妙融入作者自己的学术观点，可以说是将一首名作的前世今生娓娓道来。所选诗篇依据诗人的创作时间排列，几首重要的

诗作便可完成对诗人一生的素描，读罢可以使人对于其所处时代与人生轨迹有同情之了解。例如对于陆游，本书选取了《剑门道中遇微雨》《关山月》《书愤》《临安春雨初霁》《沈园二首》几篇，我们可以看到乾道八年（1172）在剑门骑驴入关、惆怅失落的诗人，看到淳熙四年（1177）在成都忧国如焚、作诗抒愤的诗人，看到淳熙十三年（1186）在临安厌倦宦海、心绪不佳的诗人，看到庆元五年（1199）在山阴重游沈园、潸然泪下的诗人。通过几首小诗，不仅突出表现了宋代诗歌的文学艺术魅力，一个鲜明而丰富的陆游形象也由此跃然纸上。

“问题与思考”是作者的研究所得，也是前面内容的延伸与扩展。本部分从问题意识出发，展开学术探讨，向读者指示学术创新的路径。这正是一门大学课程重要的目标。除了对于重要诗人如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杨万里的讨论外，本部分特辟一节“宋代诗人如何以俗为雅”置于卷首。一方面，诗歌题材的世俗化、审美情趣的以俗为雅是宋诗的一大特征，值得仔细申说；另一方面，以俗为雅也有着很重要的现实意义。正如书中所言：“宋人认为，审美活动中雅俗之辨的关键在于审美主体是否具有高雅的品质和情趣，而不在于审美客体是高雅还是卑俗之物。”领会了这一境界，以之观照当下，我们便能在世俗之中获得精神的超越。因而，若想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今天的社会中生根发芽，邀请人们来欣赏宋诗，不失为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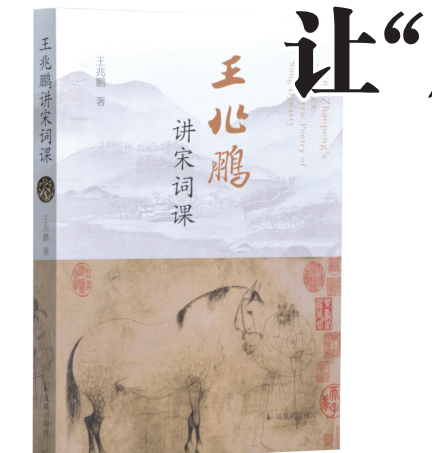
（作者单位：凤凰出版社）



王国维先生指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而提到宋代文学，言必称宋词。然而，宋代诗歌的成就同样不容忽视。宋以后，元明清历代文坛的一个共识在于，中国的古典诗歌，从总体艺术风貌来说，只有两个代表：一是唐诗，一是宋诗。可见，宋诗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堪与唐诗相比肩。

市面上有很多的唐诗选本，也有很多讲解唐诗的书，但是专门讲解宋诗的书实属凤毛麟角。《莫砺锋讲宋诗课》正是其中的佼佼者。本书著者莫砺锋是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也是中国宋代文学学会会长、中国陆游研究会会长；由他为大家讲解宋诗，可谓当仁不让。在这本书中，他从27万首宋诗中为读者精挑细选70首，无一不是宋代诗歌精华中的精华。

本书的篇章结构是著者精心的设计，第一讲“阅读背景”，介绍宋诗的整体风貌及宋诗研究的概况；第二讲“名篇细读”和第三讲“名篇浅释”，有详有略，对宋诗名篇进行解说；第四讲“问题与思考”，为作者多年治学的心得。各章既有鉴赏，也有研究，融宏观与微观于一书，这就方便读



书仍以概说全貌、漫说名家、细说作品的脉络引导读者，力求简洁明了地带给读者“含金量”更高的宋词课。作者多年积累的学术内功，在选题上就可以初窥一二。例如“漫说词人”部分，作者用极大篇幅刻画了辛弃疾胸中的英雄情结与其现实中壮志难酬的矛盾。由爱国青年到文武才略兼备的士大夫，再到被冷落、被忽视的闲居老者，辛弃疾有着太多的“意难平”，反映在他的词作中，即为独特的“英雄词世界”，“唐宋词史上，没有哪位

# 让“唐门词”飞入百姓家

□黄如嘉

词人像辛弃疾这样崇拜英雄，渴望成为真正的英雄”。作者在豪放中细绎出苏、辛等人各自不同的特点，即苏轼为“学士”，辛弃疾为“壮士”。“壮士”虽豪迈，心有家国，却被迫时所嫌；辛弃疾因此与沙场立功的岳飞、宁死不屈的文天祥有所不同。“想得不可得，你奈人生何”，辛弃疾只能把马鞭化作纸笔，将不得与难舍写成了词作，苦苦吟唱。读者若能品味出辛词的爽快，又能感受到其中的曲折。本书与其说是写出来的，不如说是讲出来的。其中不少篇章是根据作者在国家图书馆、国内各大学开展的讲座内容整理而成，因而保留了口语的生动风趣。作者带领读者重返历史的现场，像说书人一样还原词人创作的情景与心境。在书中，我们能看到柳永的错位人生、李清照的声名起落、苏轼的旷达心胸、潘阆的隐逸传奇。作者都把他们放到历史现场进行还原，重塑词中壮丽的

场景、唯美的画面，让读者进入词人建构的艺术世界和情感世界中。同时，本书的特色也在于讲课的“课”字。如同一门古典文学的课程，由综览到举例，读者既可以学习词的发展历史、源流体式、主题类型等基础知识，也可以知人论世、赏析作品。书中还特别介绍了“宋词排行榜”，这是王兆鹏教授的标志性研究成果。他用统计学的方法来研究宋词，尝试用相对客观的定量分析方法来判定宋词名篇的影响力大小。因而作者也被称为“诗词与大数据的跨界研究者”。作者用排行榜的方式来解读宋词，用科学公式发掘宋代以来的宋词“大数据”，让读者了解古代文学中的品评与词话对一首词作的影响，究竟是助力了词的传播，还是曲解了原本词意以至于是给某首词、某个词人打了“差评”？文艺评论不只西方才有，只不过中西方的表达方式略有差别。作者如今将西方的研究方法移植

陈尚君先生近年来在艰深的文献整理工作之外，也时时留心于面向一般读者的文史知识普及。他以校订全部唐诗文献、重编《全唐诗》为立足点，标举“以人为中心的唐诗研究”，其建树早为学界所公认。得益于充沛的资料占有与闲雅从容的趣味，撰作小文也多大匠运斤、优游不迫之妙。他在《古典文学知识》《文史知识》《文汇报书周报》等报刊上开设多个专栏，已结集为《行走大唐》《濠上漫与》《唐人佚诗解读》等著作，依托网络传播的迅捷，深得读者欢迎。《诗唱大唐》依然是这一创作理路的延续，不过，与前三种书籍更偏重读者耳熟能详的名人不同，在这部著作中，作者把着眼点投向了皇帝、状元、禅僧、儿童、域外来客、一般士人等唐代社会的诸多群体，为我们立体而全面地勾勒出唐诗在唐代社会写作与传播的生动面貌。

“诗唱大唐”的标题既与书中所述唐诗之万千气象相得益彰，也令我们想起傅璇琮先生在《唐代科举与文学》序言中的著名论断：“文化是一个整体，为了把握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历史活动，需要从文学、历史、哲学等等的著作中以及遗存的文物群体中，作广泛而细心的考察，把那些最足以说明生活特色的材料集中起来，并尽可能作立交叉的研究，让我们所研究的对象（不管是一个人、一群人，或是一个社会）站起来，活起来，使我们仿佛走进了那个时代，迎面所接触的是那个社会所特有的色彩和音响。”傅先生曾以此著启发无数研究者的路径，从另一角度来看，其融汇文史的立场、深入浅出的文风，无疑也为我们揭示出普及读物的理想写法。《诗唱大唐》的话题围绕唐诗展开，却并不只关注文学史上卓有成就的大家，亦不囿于文学一隅，而是深入唐代社会、文化的多层面，正展示了唐代“所特有的色彩和音响”。

依托于广阔的学术视野，作者告诉我们，唐诗并不只是书斋中的读物，上至皇帝，下至儿童，都曾是唐诗的忠实读者与作者。在《唐朝皇帝的诗歌》与《唐朝皇帝点赞过唐诗》中，作者把唐代皇帝视为普通读者中的一员，逐一梳理其创作与审美，既对他们的文学趣味进行排名，对政治建树也有点为止的评鹭，可以窥见作者之史识。《唐代的孩子在想什么》介绍了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文献中所见的学郎诗，妙趣横生，“盼望着下课，免不了打闹”真是孩子们从古至今的相通之处。僧人们偏爱能够激发禅意的诗作，以此阐释佛法，海外来唐的客人们也参与到唱和之中，记录了带有异域色彩的悲欢。书中写道：“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时代的作品可以如此的立体而多元，丰富而日常。”《诗唱大唐》提示我们注意这些拥有不同身份的群体，他们曾共同参与了唐诗气象的构建与传播，对唐代文学的全面描述，对此自然不应忽视。

对于杜甫、刘禹锡、皮日休、陆龟蒙等大作家，作者则力去陈言，试图为普通读者提供新的认知角度。《杜甫的盛世危言》细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脉络，联系相关史事，力图全面解读杜甫忧国伤世的心声。文末写道：“这首长诗的生命力，则历久弥新，杜甫的警告，应为任何时代的统治者所记取。”《〈客堂〉：杜甫生命至暗时刻的心声》再次阐发作者《杜甫为郎离蜀考》中的重要结论，又借用“至暗时刻”之名，为观察杜甫晚年心态提供了不少陈尚君先生的性情之语，白居易对女性的虚伪，崔融献媚的无耻，皆难逃作者史笔之贬。又如书中对吹捧武后者的鄙夷，亦堪玩味：“有些人看到乾陵无字碑，就感叹女主具有让后世评说的高风亮节——对这些无知者，真该给几个耳刮子。”

即使是面向一般读者的介绍性文章，作者也不忽视重要学术成果的普及，引及浦江清、傅璇琮、孟二冬、陈冠明、徐俊等杰出学者的研究，皆隆重称道与表彰。作者在回忆与孟二冬教授的交往时写道：“虽为率尔之谈，但所涉文献之丰沛复杂，读者当不难体会。学术基础研究，应得到尊重。”这既是对孟二冬教授成就的认可，更是作者多年来秉持学术公心、致力于基础研究的甘苦之言。

作者师承中国传记文学研究的先驱朱东润先生，朱先生曾在《八代传叙文学述论》中对传记的写作提出这样的要求：“文学的形态是外表，忠实的叙述是内容。”作者浸润唐代基本文献多年，对史实的严格讲求自不待言；书中叙述杜甫、韩偓、王鲁复、花蕊夫人的事迹，常有兴会意到的文学性叙述，无疑也是优秀的诗人传记，可谓忠实地践行了朱先生的理想标准。从具体的人入手，进而真正展现整个大唐的色彩与音响，正如作者所说，“每一个唐代诗人都曾活生生地生存过。”读者翻阅本书，当能领会此语。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读《诗唱大唐》

□卢多果

# 唐代所特有的色彩与音响

宋词普及与目前流行的新媒体相结合，将古典内容送进今人心中之境之中，将唐门硕果撒向更多“寻常百姓家”。正如本书前言所说，力求以学术的态度做宋词的普及，这是作者本人一直努力的目标，也是本书匠心之旨。在笔者与王兆鹏教授相处交流的过程中，可以看到，无论是为书稿拟定富有诗意的题目，还是为读者讲录线上课程，抑或是即兴用楚调吟唱宋词，王先生都保持积极的开放态度，乐于探索更丰富的传播路径。如果说古典诗词词像一泓清泉，那么普及的说过程就像是守护它、挖掘它的工作，可以让这泓泉水汨汨流淌，终归中华儿女的精神江海。将这泓泉水捧献给更多的读者，正是我们不懈钻研的终生事业。

（作者单位：凤凰出版社）



凤凰出版社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